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



刘家贵 和 云 / 著
潘海岚 茶洪旺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

刘家贵 和 云 著
潘海岚 茶洪旺

本书由云南民族大学资助出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边 江
责任校对：杨晓莹 张长松
技术编辑：王世伟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

刘家贵 和 云 著
潘海岚 茶洪旺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csp.com.cn

电子邮件：esp@c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6.75 印张 200000 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6884 - 7/F · 6136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曲折历程与 重大突破	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探索	1
二、1957 年以后“左”倾思想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主张的否定和批判	6
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的思想	10
四、党中央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 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7
第二章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与 特点分析	22
一、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概述	22
二、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 及特点	29
第三章 大力发展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 深远意义及重大作用	50
一、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 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51

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59
三、大力发展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60
四、大力发展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62
五、大力发展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 经济的作用	64
 第四章 制约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因素分析	 81
一、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影响和束缚西部人积极 参与市场竞争	82
二、区位优势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较大 的约束	84
三、制度供给短缺恶化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发展 环境	86
四、资金短缺成为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瓶颈”	90
五、劳动力素质低、人才缺乏使西部非公有制 经济得不到足够的人力资本的支持	93
六、基础设施薄弱削弱了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的 竞争力	95
七、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手段与理念落后成为西部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内在约束	96
 第五章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总体构想	 100

一、指导思想·····	100
二、重点发展领域·····	103
三、发展目标·····	109
 第六章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小企业的启示·····	 110
一、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地位及作用·····	110
二、西方发达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12
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小企业的启示·····	121
 第七章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研究·····	 125
一、彻底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125
二、为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创造宽松良好的外部环境·····	129
三、加大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积极拓展非公经济发展空间，构建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双赢”的发展格局·····	135
四、加强私营企业内部管理和制度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	136
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引导和政策扶持，建立促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引导服务体系·····	141
六、健全和强化中介组织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挥工商联、行业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在非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45
七、提高私营经济经营者自身素质，规范经济行为·····	146

八、改善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环境, 加快构建 非公有制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	148
九、坚持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新发展观, 积极实施 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人才战略, 为 非公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	154
十、抓住机遇, 实施大开放大发展战略, 促进西部 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跨越式发展	157
十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保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159
 第八章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个案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162
一、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63
二、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187
三、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机遇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3
致谢	204
后记	206

非公有制经济按通常的理解是指除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才合法化和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选择了改革，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呼唤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呼唤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位置，计划经济要求单一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则同非公有制经济有着天然联系。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是要有产权明确的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单一的经济主体不可能进行市场交换，只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能造就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追求经济效率，只有非公有制经济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效率，这已经是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所证明的道理。但是在探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党曾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认识过程，非公有制经济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

第一章

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 曲折历程与重大突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其中包括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甚至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存在和发展，承认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混合经济，而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这样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

新中国刚刚成立，刘少奇同志就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①在1949年召开的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提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②这就是著名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思想。刘少奇对五种经济成分作了科学分析：“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③对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④陈云同志也说，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都会发展，各得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② 《中共党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4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页。

④ 同上，第428页。

其所”。^① 哲学家杨献珍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正是五种经济成分的综合。“综合经济基础论”一提出就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或者按照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它是排斥任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根据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曾经思考和探索过在公有制经济以外，利用私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甚至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提出欢迎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投资办厂，对国有企业实行租赁、拍卖。他说：“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无产阶级国家“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② 他反对不加分析地称“资本主义是祸害”，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者“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③ 可惜后来斯大林放弃了列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思想，改变了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建立起单一僵化的公有制经济模式。而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突破斯大林模式，重新提出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表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

早在1951年2月刘少奇就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④ “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乃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行的最基本的任务”。^⑤ 但是，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所继承的是一个失业严重、百业凋敝的烂摊子。这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内部发行），第13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9页。

③ 同上，第528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⑤ 同上，第7页。

种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人民群众建设先进的工业国家和过幸福富裕生活的要求形成强烈反差。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们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因素和手段恢复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和劳务总量，符合人民意愿，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刘少奇、陈云等同志还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和发展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会影响、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且还会激活、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首先，个体私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陈云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② 的观点。这一观点被收入党的八大的决议中。其次，它能满足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需要，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③ 1956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指

① 《中共党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②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③ 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9页。

出，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民的需要，增加市场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城市的就业人数，对国家有利无害。^①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谈话也指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明确肯定，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由于适应了社会需要而得到迅速发展，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他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后一个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而实行的一种经济形式，毛泽东将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②第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一点个体私营经济有利于搞活社会主义经济，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多元互补功能。刘少奇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没有灵活性，没有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要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③周恩来也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④这是充满辩证法的鲜活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允许私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可以使公有制经济不断吸收私有制经济的优点来丰富、完善和提高自己，克服僵化与保

①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② 毛泽东1956年12月7日的谈话。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9页。

③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讲话》，1957年5月7日，转引自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④ 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9页。

守，而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得纯而又纯，变成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实践证明只会使社会主义经济因缺乏竞争对手而丧失生机与活力。因此，灵活性与效率总是和多样性分不开，而单一、缺乏竞争只会造成经济的停滞与僵化。

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解放初期直至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是同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当时第一代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脱贫致富，经济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展生产力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从而才有可能提出保护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当时虽然认识到保留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必要性，但还不可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而如果不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和依据，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就不那么充分，这也正是我党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探索很快就中止的原因之一。

二、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对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主张的否定和批判

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按照建国初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路发展下去，中国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含有市场机制的，更具有灵活性与多样性的，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幸的是，这种可贵的探索很快就在理论上受到严厉的批判，在实践中也被迫完全中断了。中国的经济建设长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走的是一条否定个体私营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实行单一公有制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调节的经济

发展道路。

我党探索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进程之所以完全中断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以后“左”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日益明显和发展。邓小平同志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崇高威望和一言九鼎的地位，一方面影响一部分领导思想跟着“左”倾，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内心并不赞同他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无法再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探索。从党的八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在下列重大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和国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还是不断进行生产关系变革，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断升级？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积极进步的因素还是消极落后的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只能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决定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认识。

毛泽东同志1957年以后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发生了失误，陷入了“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矛盾，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最危险的敌人来自共产党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要不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以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阶级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等观点，完全脱离我国现实，有的纯属无中生有。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阶级斗争凌驾于发展生产力之上，甚至以政治冲击取代经济建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货币关系、农村集市贸易都必须加以限制直至取缔，个体私营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必须加以改造、限制，甚至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①的口号，主张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且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即企图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实现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毛泽东同志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大二公三纯四急”，以致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公有制越纯越大，商品货币关系愈少，阶级斗争越尖锐就越接近共产主义。毛泽东在他的“五七”指示中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最终所要建成的是一种消灭了个体私营经济，取消物质利益原则，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认识上的错误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所利用，更把这些错误的“左”倾思想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在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口号下农村自留地归公，集市贸易被禁止，生产陷入瘫痪，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非公有制经济几近绝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只剩下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商业经营者14万户。

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的探索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回潮”。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局面。人们普遍感觉到导致国民经济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由于实行了“左”的脱离实际的政策。党内一些负责同志开始重新思考恢复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同志。1962年，邓子恢提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而在农业生产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发展家庭经营。在统一经营和管理的前提下，抓好一个“包”字。他说，由于农业是野外作业，手工操作，周期性长，所以农业生产要“包”，不“包”责任制就建立不起来。在分散的山区，应允许农户单干。他同时还主张要恢复和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他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的支持。^① 他们都认为经济不能搞得太死太纯，要有点灵活性和多样性。邓小平同志说：“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② 小平同志实际上是赞成、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的。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③ 他还引用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比喻来说明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应一视同仁。他还特别强调：“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就是要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目的就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恢复集市贸易、发展商品生产等做法是反对的。随后不久他就反复批评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

①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8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③ 同上。

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毛泽东斥之为“单干风”和“黑暗风”（指有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①邓子恢由于在合作化时期就主张慢慢来而被斥责为“小脚女人走路”，现在又提倡单干，分田到户，因而被斥责为“一贯右倾”而被撤去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该部也随即被解散，这次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探索就这样被迫中断了。

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大力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

在经过历史的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以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党开始反思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和途径，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重新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发展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是同他的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三条主线，又是一个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对建国初期至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②又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力”。^③他还深刻地总结了以往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

①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③ 同上，第137页。